

海外学者纵论温州模式的起源¹

李春来^{1,2}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 北京 102488;

2. 中共温州市委党校, 浙江温州 325038)

【摘要】海外学者从历史文化传统的渊源、制度机制创新的催生、不利自然地理环境的倒逼、地方党委政府的作用等多重视角, 来剖析温州模式诞生的深层次动因。

【关键词】海外学者; 温州; 温州模式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714(2020)12-0146-03

许多海外学者认为“温州以其独特的发展方式和独特的行为方式创造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奇迹”。他们纷纷指出, 温州模式的发展存在着固有的悖论: 温州模式是在一个工业资源贫乏、能源行业薄弱、交通运输落后、国有企业弱小、通过外贸或者外资参与到世界经济程度不高的地区出现的。因此, 海外学者试图从历史文化传统的渊源、制度机制创新的催生、不利自然地理环境的倒逼、地方党委政府的作用等多重视角, 来剖析温州模式诞生的深层次动因。

一、历史文化传统说

海外研究者在探讨温州模式的形成时, 往往都会追溯温州商业文化的历史遗产。

基思·福斯特认为, 温州模式是一个共同体通过增加自己的资金, 使用商业技术来开发被国有企业和市场系统忽视的潜在的日常消费品市场的例子。由此形成的资本被用来激活了家庭生产。在温州模式的形成过程中, 诸如传统的商业文化环境这样的非正式因素所发挥的影响, 要远远大于其他因素的影响。1978 年以来温州经济的成功, 可以被看作是经济力量的复兴和释放。在历史上, 温州依靠大海进行经济、贸易以及文化的交流往来。由于地形复杂, 温州和浙江其他地区以及其他省份的陆上联系比较少。因此, 在 1949 年以前, 温州的经济集中在传统小规模商业和手工业上。即使是在计划经济时代, 传统经济活动和传统组织仍继续在温州发挥很大的影响。到 1980 年代的末期, 和全省其他地方相比较, 温州的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随着经济改革期间温州模式获得全国广泛关注, 它也开始为外国观察家所注意。事实上, 早在外部的官员和媒体意识到或者准备承认温州的销售和生产的个体方法的存在之前, 温州人民似乎已经安静地并且坚决地开始复兴地方经济, 提高他们自己的生活水平。1980 年代温州经济发展十分迅速。在 1981—1985 年期间, 市区的工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收入以及农民的人均收入分别增加 130%、156%、122%、150%。平均每年的农民收入从 1977 年的 55 元人民币增加到 1985 年的 480 元人民币, 三分之一的农民的收入超过了 1000 元。60% 的农业劳动力进入到工业和服务业。在 1988 年, 有 954000 位该市居民从事非农业生产。^[1]

¹收稿日期: 2020-11-16

作者简介: 李春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在读博士研究生, 中共温州市委党校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经济史研究。

叶新月、丹尼斯·魏认为，温州模式植根于强调务实的地区文化传统之上。在历史上，建立在企业家精神与农村市场基础上小企业就是温州经济的脊梁。温州在南宋年间就是全国的商业中心之一，具体而言是全国的手工业生产和国际贸易的中心之一。在清末，随着海运与现代工业的发展，温州的港口地区开始兴盛起来。到 20 世纪 30 年代初，温州成为中国主要的沿海港口之一，还是全国手工业与轻工业中心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温州国有企业不多这一事实，为温州在实施改革和发展私营经济提供了更为有利的环境。当许多城市还有国有企业下岗工人的包袱时，温州的民营企业能够轻装前进，没有大的干扰。温州模式以“小商品、大市场”著称，它的核心在于小规模、制造业导向的、家庭所有的私营企业，其销售网络连接着全国乃至世界市场。但是，大多数企业规模很小，主要面向国内市场，地处农村。家庭是温州的主要生产单位，它依赖传统的社会网络来获取原料、信息以及组织生产和销售。历史悠久、分布广泛的温州生产和销售网络有助于当地经济融入更大的市场。^[2]

吴斌（音）、瓦尔特·扎明认为，数千年来，商人在温州受到高度重视，地位很高，这已经成为传统。温州是捍卫商业行为的价值“永嘉学派”的发源地。“永嘉学派”认为流动与生产同样重要。这与以儒家为基础的主流文化相当不同，在主流文化中，商人排在士、农、工、兵之后。永嘉学派对温州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甚至一直延续至今。上述情况成为温州的独特优势，因为当中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启动经济改革时，温州就立即建立和发展起非公有制经济。由于地理、资源和交通的局限，温州人历史上就盛行迁徙。改革之初，温州 68% 的土地面积是山地和丘陵，耕地约占总面积的 10%。人均耕地面积不足 0.04 亩，平均每个农村劳动力所占耕地不足 0.13 亩，这相当于当时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耕地不足加上交通不便，这些成为推动温州历史上的迁徙活动的主要因素。随着温州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发展小商品生产，成千上万的温州人到全国各地推销温州的产品，从各地的零售商那里带回订单。这样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以及他们与家乡地区的联系为建立和发展那些坐落于温州的全国性市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如果不是温州人的迁徙流动传统的话，温州的企业家根本不可能建立全国性的小商品市场。^[3]

傅士卓指出，地方历史是温州模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温州人对他们独特的语言和文化有着强烈的地方自豪感。由于被崇山峻岭所分隔，使得温州话成为一种截然不同的、晦涩难懂的方言，即使那些生活在离温州周边的人们也难以听懂。温州话的独特性有助于温州人团结一致，这让那些出门在外的温州人得以形成一个圈子。最后，温州人拥有悠久的经商传统和对外贸易的天分，这些传统和天分从来没有完全消失。当代温州就建立在这些历史遗产之上。^[4]

二、制度机制创新说

部分海外学人将温州模式的诞生归结为制度创新的产物。张贵斌（音）、钟秦（音）指出，就制度安排而言，温州模式以三个创新而闻名于世。第一个创新是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中期，个体家庭企业“戴红帽子”的实践。第二个创新是从 8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中期，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形成。第三个创新是 90 年代末以来，从股份合作制企业向有限责任公司的转型。温州模式被公认为是“来自底层的变革”的典型案例，即这些创新及其演化的激进本质是个体、家庭以及政府官员在地方层面追求实际利益，而不是遵循“自上而下的”指示的产物。温州经济快速增长背后的重要推动力是家庭企业所代表的“原生态的企业家精神”。面临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的不发达，家庭成员提供了低廉的和灵活的资源来填补这些市场所造成的空缺。家庭企业有两个主要的优势。第一，由于自我增强的内部契约，家庭关系能够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第二，彼此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家庭成员能极大地降低代理人成本。家庭企业的这些优势极大地适应了中国目前不完善的市场环境。^[5]

艾伦·刘认为，如果温州人没有灵活地利用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漏洞的话，温州传统的家庭工业、长途贩运和专业市场就不可能在 1980 年以后蓬勃复兴。在经济层面，温州的家庭工业擅长生产那些大型现代工业所忽视的小商品。温州的消费品行业的确是在“中国的工业结构的漏洞当中”发展起来的。在社会层面，温州人利用计划经济体制最薄弱的环节分配和流通。温州利用其庞大的销售队伍来填补这一漏洞。在政治层面，温州的民营经济在“控制真空”时期迅速发展，当时全国政府仍然没有就转向市场经济而进行必要的调整，这使温州处于有利地位。^[6]

三、绝境求生说

一些海外学者强调，正是温州所面临的地理、交通、土地等诸多不利因素的“倒逼”，激发了温州人民埋头苦干的精神，进而催生了温州模式。

张晓波（音）等华人学者认为，尽管温州最初的不利环境限制了经济发展，但是它也创造了机会。温州缺乏自然资源、地域的不便和糟糕的交通阻碍了温州经济的发展。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温州模式”的形成也是面对不利因素走投无路的产物。从系统和经济改革的视角来看，糟糕的交通状况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是一大优势。在信息沟通不便的时代，交通不便的偏远地区较少受到政府的影响和控制，由此有利于那些处于探索阶段的事物或者那些暂时被禁止的事物的发展。这是温州民营经济发展和市场导向改革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因素。^[7]

蔡欣怡认为，温州与其他南方沿海城市一样，毗邻台湾使它在战略地理位置上成为一个高风险区域。因此，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浙江省政府都不想将有限的资源用于温州的基础设施和工业发展。尽管温州占浙江省土地面积的 11%，人口的 15%，在整个计划经济年代，它得到的固定资产投资只占全省的 1%。此外，温州的耕地也严重不足：人均耕地只有 0.42 亩，而全省人均耕地是 0.65 亩，全国人均耕地是 1.4 亩。温州人多地少的生态限制意味着，在改革初期，温州 44%至 49%的农村劳动力（180 万劳动力中的 79 万至 88 万）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在这样的发展资源条件下，由小商品生产者、零售商和批发商所组成的民营经济在温州市的出现时间，不但要早于中国其他地区，而且比其他地区的民营经济也更有活力。据估计，在 1979 年农村改革正式启动以前，温州地区就已经存在 1844 家个体户了。^[8]

四、地方党委政府推动说

绝大多数海外学者都承认，温州地方党委政府在温州模式的产生中，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刘群（音）指出，在中国转型初期，尤其是在从中央控制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阶段，温州地方政府扮演了“第一推动者”的角色。在起步阶段，如果没有温州地方政府放松管制，采取激励政策，民营企业将根本不可能出现。因此，民营企业最初的外在推动力来自计划体制之外的地方政府，因为地方政府需要增加社会财富。在民营企业的发展和扩张阶段，温州政府在决定民营企业的发展上同样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温州地方政府的卓越治理营造了一个有利的市场环境。^[9]

刘雅灵指出，只有在温州地方政府对某些当时属于半合法或非法的经济活动——它们违反了当时的国家政策，但却是民营经济顺利运行所不可或缺——采取默许态度的情况下，私有化和市场化才成为可能。像“挂户”经营、“民间金融”、“土地流转”等得到地方政府包容的半合法或完全非法的经济活动，在温州数不胜数。就“挂户”经营而言，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在温州的宜山区出现了，当地家庭工厂生产的再生棉布出现大量积压，而当地集体所有制的供销社只许可那些政治可靠的农民作为供销员从事这些积压产品的长途贩运，这迫使当地干部另辟蹊径。1978 年第一任宜山区委书记就向苍南县政府请示，要求允许农民从事家庭企业、商业和长途运输，但却没敢提当地经济中长期存在的挂户经营。1981 年中央派干部到宜山来调研家庭工业兴起和市场经济繁荣的情况，他们的结论是，尽管挂户经营能复兴当地的商品生产，提高地方收入，但是它违背国家政策。因此，宜山区委书记受到批评，挂户经营遭到禁止。由于没有了挂户经营带来的便利，宜山的纺织业很快陷入停滞。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宜山区党委不得不向市政府请示，请求恢复挂户经营试验。1987 年 10 月，在温州被国家指定为沿海试点城市之后，市政府颁发了一系列规范挂户经营双方行为的暂行规定。这时，在当地各级政府的默许下，温州已经到处实行挂户经营了。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不是当地干部在保护各类民营经济活动方面迈的步子足够大的话，民营经济要成为整个温州经济的主体将是异常困难的。^[10]

徐威、谭 K.C 等华人学者认为，温州农业的专业化和运营规模的不断增长，既反映了农民的首创精神和改革前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性，也表明了干部的积极推动以及地方政府采取适合政策的重要性。那种单方面强调农民自发的主动打碎公社体制，给改革进程提供了所有推动力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最初的步骤是党和政府启动的，农民主要是回应这些步骤，并且最初犹豫不决，稍后才开始活跃起来。在实施改革政策和决定的过程中，地方干部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尽管去集体化可能给人这样

一种印象：即政治最终与经济分离，政治只是消极的因素。事实上，放弃直接经营企业的角色，并不意味着地方政府不再参与农村工业的发展。温州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制定税收政策、发行银行债券、提供宽松的政策环境来促进农村工业的发展。^[11]

参考文献:

- [1] Keith Forster. The Wenzhou Model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mpressions [J]. China Information, 1990, 53 (05): 53-64.
- [2] Xinyue Ye, Yehua Dennis Wei. Geospatial Analysi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Case of Zhejiang Province and the Wenzhou Model [J].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2005; 46(06).
- [3] Bin Wu, Vaiter Zani. Exploring Links betwee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Wenzhou's Development [J]. Paper for Community Research Networking Conference, 5th-7th November 2007, Prato, Italy.
- [4] Joseph Fewsmith. Chambers of Commerce in Wenzhou Show Potential and Limits of "Civil Society" in China [J].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2005(16).
- [5] Guibin Zhang. Zhong Qin,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Businesses in China: 1978-2004 [R]. Asia-Pacific Economic and Business History Conference, 2008.
- [6] Alan P. L. Liu. The "Wenzhou Model" of Development and China's Modernization [J]. Asian Survey, 1992; 32 (08): 696-711.
- [7] Xiaobo Zhang. The Formation of Wenzhou Footwear Clusters: How were the Entry Barriers Overcom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gricultural Economists Conference, Gold Coast, Australia, August 12-18, 2006.
- [8] Tsai, Kelley S. Back-alley banking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China [J]. Ithaca, N.Y.;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 [9] 刘群. Case Studies of Local Private Enterprises in Zhejiang Province, China [J]. 开发金融研究所报, 2008, 37: 143-173.
- [10] Yaling Liu. Reform from Below: The Private Economy and Local Politics in the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of Wenzhou [J]. The China Quarterly, 1992, 130(06).
- [11] Wei Xu, K.C. Tan. Reform and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restructuring in rural China [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1(17): 165-181.